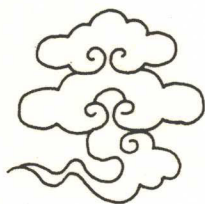


1-5-5

张羽琼 /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贵州古代教育史

宋汪居卿授淳州主簿至任興學設校雖學科上重生
官職校舉學不施民有訟者慮發其良心而民欲訟
桑修戎伍捕盜厥民如子善政多著百姓愛戴受
累官大司農
湖海



史



张羽琼／著

贵州古代教育史

冯楠题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古代教育史/张羽琼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2. 3

ISBN 7-80650-270-X

I. 贵… II. 张… III. 教育史—贵州省—古代
IV. G5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1248 号

贵州古代教育史

张羽琼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字数 15.375 印张 385 千字

印 数 1—1 000 册

版次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270-X/G·144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金丰路 5 号 电话:6774152 邮编:550004

前 言

全球化既是我们发展的机遇,也是我们必将应对的新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怎样保持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并进而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展示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得到创造性的发展,是学术界经常讨论的话题。向外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向内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学习西方,但不成为西方附庸,转换传统资源,但不墨守成规,已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贵州古代教育史》正是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

贵州古代教育是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现代化离不开民族精神资源的陶养。深入研究贵州教育发展史,阐明其蕴含,彰显其光彩,不仅有助于学界正在兴起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而且还能激活民族精神,为贵州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

然而遗憾的是,对贵州教育史的研究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就现有成果来看,研究现代多而关注古代少;零散文章多而系统著作少;个案研究多而整体研究少,至今未见一本专门研究贵州古代教育的著作,这对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贵州未免是一种不足,同时也与国内方兴未艾的区域文化研究热潮不大合拍。由是之故,本人不揣简陋,查阅了贵州现存的大量史书、方志、文集、笔记及少数民族文献资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贵州古代教育(包括中原儒学教育及少数民族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状况的系统描绘,廓清贵州古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

贵州自古为西南边地,汉唐、宋元及明代的中原王朝,均在开疆拓土、武力治边的同时,积极向西南地区推广中原文化教育制度。贵州古代教育的发展是在中原文化和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交

流、碰撞、融合的主线下进行的，中华文化在贵州的推广、发展、更新是总趋势和大潮流。在此视野下，本书重点讲述先秦至建省以前贵州地区教育发展状况以及中原文化在贵州的早期传播；明代和清代前中期贵州府州县学、书院、私学的兴起与发展，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及其对文化教育的影响；清末“新政”时期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启动等。

此外，在开发和建设贵州的历史长河中，各族先民不仅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教育文化，而且在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交融中通过传承和创新推动了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教育的个案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我国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而且还能为加快促进少数民族的自身开放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因此，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教育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也是笔者力图阐述的重要内容。

本书主要运用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围绕贵州古代教育发展的主线进行研究。稽考历史文献所记，摭拾地方志书所载，对于复原贵州古代教育史的总体风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文化现象，贵州古代教育的众多要素又是以非文本的形式存留于世居民族的生活习俗、道德规范、社会组织乃至宗教礼仪之中，这就要求笔者必须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文本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将史料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与历史记载相互比照、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从而对贵州古代教育进行动态的、全面的描述。本书将时间下限至清末，意在対贵州古代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和时代特征有一个完整的交代。

由于本书所述时间悠远绵长，加之历史资料零碎分散，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很少，给本书的写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同时，限于学识和功底，本书还存在不少缺憾，许多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探究。

著 者

目 录

第一章 明代以前的贵州教育 (1)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贵州教育..... (1)

第二节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教育的 初步发展 (16)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贵州教育 (34)

第四节 两宋时期贵州儒学教育的兴起 (45)

第五节 元朝时期的贵州教育 (61)

第二章 明代贵州教育的蓬勃兴起 (67)

第一节 明代贵州社会发展概况 (67)

第二节 明代贵州官学的兴起与发展 (83)

第三节 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 (116)

第四节 明代贵州私塾的发展..... (131)

第五节	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与发展·····	(137)
第六节	明代贵州教苑英华·····	(149)
第七节	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影响·····	(176)
第三章	清代前中期贵州教育的全面发展·····	(189)
第一节	清代前期贵州政治经济状况·····	(190)
第二节	清代前中期贵州学校教育的新发展·····	(207)
第三节	清代前期贵州民族教育的新发展·····	(224)
第四节	清代贵州书院的迅猛发展·····	(240)
第五节	清代贵州私学的发展·····	(250)
第六节	清代前期贵州科举制度的发展·····	(263)
第七节	影山文化与沙滩文化·····	(272)
第四章	贵州少数民族的传统教育·····	(298)
第一节	古老悠久的家庭教育·····	(305)
第二节	讲究内聚的家族教育·····	(313)
第三节	提倡自律的村寨教育·····	(340)
第四节	彝文教育与水书教育·····	(354)
第五节	丰富多彩的社会习俗教育·····	(376)
第六节	影响深远的原始宗教教育·····	(393)

第五章 清末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启动	(406)
第一节 清末传统教育改革的展开	(407)
第二节 清末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前奏	(416)
第三节 贵州近代教育体制的初步确立	(432)
第四节 清末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历史影响	(465)
主要参考与引用书目	(476)
后记	(482)

第一章 明代以前的贵州教育

贵州作为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的一部分，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建国以来陆续发现的数十处古人类文化遗址证明，自古以来，贵州高原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场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曾指出：“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在贵州这片土地上，自从出现了人类，就产生了教育活动。古代先民在开发贵州的艰苦斗争中，创造了贵州的远古文明，贵州的古代教育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贵州教育

一、贵州先民的早期教育活动

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从 200 万年前开始，远古的人类就已经劳动、生息、繁衍在中国的土地上。20 世纪以来，我国科学工作者愈来愈多地发现原始人群活动的遗迹。考古工作者将现代新技术手段运用于考古研究，获得不少新的发现，把人类在中国出现的时间逐步推前。1927 年发现的北京西南周口店猿人遗

骸化石,称为“北京人”,科学测定距今大约四五十万年前;1963年至1965年发现的陕西省蓝田县猿人头骨化石,称为“蓝田人”,科学测定距今大约五六十万年前;1965年发现的云南省元谋县猿人牙齿化石,称为“元谋人”,科学测定距今大约170万年前;1985年在巫山县(原属四川省,现属重庆市)发现人类的附有两颗牙齿的下颌骨的化石,经科学测定距今大约200万年前,称为“巫山人”,这一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依据科学测定的“巫山人”的年代,中国的教育也已有200万年的历史。但这不是绝对的结论,如果考古科学发现新的史实,有比“巫山人”更早的猿人存在,那么,中国教育史的开端还要随着新的发现再往前推移,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贵州的历史与祖国其他地区的历史一样,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时代。20世纪中期以前,贵州地方史的研究长期停留在文献资料上,原始文化也仅仅局限于民族学调查资料和神话传说,缺乏考古实物依据。建国以后尤其是近2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贵州境内发现了多达50余处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迄今已发掘的20多处遗址涵盖了贵州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文化。大批古人类遗骸和遗址的发现,向世界展示了贵州史前文化的辉煌成果,不仅为学术界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实物资料,而且用确凿的事实证明远古的贵州并非“文化荒漠”,它曾经是远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地方,是我国古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在众多的古人类和古文化遗址中,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堪称我国长江以南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1964年至1965年,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等先生主持下,中国考古工作者对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进行发掘,经研究确定了观音洞遗址为旧石器时代早

期文化遗址^①。1973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继续进行发掘,共出土了四千余件石制工具和20多种动物化石。由于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石器加工特殊,文化独具特色,被命名为“观音洞文化”。“观音洞文化”的发现,将贵州的历史向前延伸到了二三十万年以前,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向世人证明,在贵州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中华民族祖先活动的踪迹。由于观音洞文化遗址地层明确,材料丰富,考古学家赞叹:“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②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说:“尽管我国早期古人类和同时代的文化遗物闻名全世界,但华南地区早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很差。观音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专家们经过大量比较和研究认为,与中国境内同期其他旧石器文化相比,“观音洞人”在石器的制作上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据此,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提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主要有三个文化区:其一是山西的西侯度文化和陕西的蓝田文化;其二是北京的周口店文化;其三是贵州黔西的观音洞文化。樊树志先生也在他最近出版的《国史概要》一书中认为:“观音洞文化与北京人文化分别是中国南方、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③学术界将贵州黔西的观音洞文化与山西的西侯度文化、陕西的蓝田文化和北京的周口店文化相提并论,充分说明黔西观音洞文化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它的发现,抚去了历史的尘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否定了所谓贵州是“不毛之地”的传统说法。

迄今为止,贵州已发现的古人类还有“桐梓人”、“水城人”、“长顺人”、“兴义人”、“穿洞人”“桃花洞人”、“开阳人”、“大洞人”、“安

① 裴文中等:《贵州黔西观音洞试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5年(3)。

②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第一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 樊树志:《国史概要》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龙观音洞人”等等。1972年发现的贵州桐梓岩灰洞文化遗址,出土的炭屑和烧骨,成为目前我国华南地区发现最早的人工用火的证据。1973年发现的水城硝灰洞文化遗址,科学测定其年代介于“北京人”、“山顶洞人”与“柳江人”之间。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灰烬层、炭屑、烧骨与烧石,是华南地区古人类用火遗迹最丰富的遗址。1975年发现的兴义猫猫洞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器和角器,说明贵州古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其生产技术有了新的进步。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普定穿洞文化遗址发掘了大量石、骨器,其中出土的多件磨制骨器,为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骨器的类型、用途及加工工艺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中国首次提供了同一遗址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对解读贵州史前文化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①。1992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对贵州盘县大洞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多次清理发掘,发掘出两千多件石器,40多种动物化石及丰富的用火遗迹。“大洞因其规模宏大、遗存丰富,从发现至今只短短数年,但已跻身于我国南方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之列,引起国内外史前学术界的普遍关注”。^②被列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成果之首。

上述古人类文化遗存和遗址的发现,充分说明了贵州曾是人类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贵州古代先民在与大自然的艰苦搏斗中,既改造自然也改造自己,贵州的古代教育就在这些古人类的艰苦活动中开始起源。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教育起源于物质生产劳动,起源于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们传递社会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实际需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

① 张森水:《穿洞史前遗址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95(14)。

② 沈冠军、刘军、金林红:《贵州盘县大洞遗址年代位置初探》,《人类学学报》1997(13)。

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解决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在远古时期,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社会生活极其简单,尽管教育还没有从物质生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实践活动,但对人类社会而言,不论其社会形态多么简单,都需要教育来为其物质生产和人的再生产服务,以推动社会的前进。因此,教育活动在原始人群的生活中普遍存在。

人类的早期教育与人类生存的迫切需求紧密相连。人们为了保证生存,需要用教育来交流和传授生活知识、劳动经验和技能等等。人们为了生活而进行群体生产劳动,为了使劳动更有成效,必须制造劳动工具。虽然他们的劳动工具极其简单粗糙,经验极其有限,但是把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年轻的成员,使年轻一代知道群体生活和生产活动的知识,是年轻一代不断成长和社会生活继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人类靠生产维持自身的生存,靠教育维系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延续。人类早期的教育活动,就起源于社会成员传递社会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实际需要。凡是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所必须具备的经验、知识、能力、品德、规则和习俗,都是教育的内容,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学习和培养。如木器、石器工具的制作和使用;火的控制和使用,采集食物的技术和经验;共同生活规范的遵守;语言的使用等等。正是在极其艰苦的生产和生活斗争中,远古居民创造出了人类最初形态的教育。而不同群落的不同的劳动经验和技能,也借助教育活动,得到保存、传播、推广,成为全社会共有的生产能力,并代代相传,从而推

动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①

生存和发展是推动人类教育进步的两种基本力量。正如当代人最关心生命和生存的问题一样,生命和生存也是古代居民最为关心的首要问题。因而,“自我保存”乃是原始形态教育的核心和基础。由于险恶环境的威胁,古代居民非常迫切地要将保存生命的知识和技能作为最重要、最急需的教育内容加以传授和交流。为了让下一代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古代居民开始有意识地向年轻一代传授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的知识经验。这时的教育虽然没有严密的计划,但它已经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而且其目的性也在逐步增强。

大约距今一万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产生,磨制石器以及陶器、纺织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到生产经济阶段。耕种土地,饲养禽畜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来源,间或还有剩余。这样的生态环境使人口可以较快增长,生活比较稳定,各种社会制度得以形成。在这场社会经济革命中,教育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贵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主要有威宁的中河,赫章的可乐,毕节的青场,平坝的白云等。据专家对这些遗址出土文物的研究可知,这时贵州先民的劳动本领有所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比过去增强,已经学会了磨制石器,制作陶器,建造房屋,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社会经济大大提高。劳动不仅创造了初步的生存物质和原始文化,也改造了人类本身。这时人类的体质包括大脑已与现代人完全一样。同时,贵州各地出土的形式多样、造型优美的陶器及骨、蚌器饰物,反映出贵州古代先民在满足了初步物质生活之外,开始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教育不仅使人们熟练地掌握了新的生产和生活知识,而且推动人们去进行原始艺术的创造。

^① 关于教育起源的争论,在我国近年来又有所展开,参见《社会科学争鸣大全·教育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学术界对贵州古人类遗存和古文化遗址的研究成果证明,贵州古代先民在极其艰苦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了原始形态的教育,丰富了贵州史前文化的内容。从贵州出土的石器时代的文物研究中可以知道,当时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生产和生活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它包括以下内容:

1. 石器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从观音洞等遗址中出土的遗物可见,石器在用途上已开始分类。石核是用来投掷以击中野兽的,石片是用来切割的。从石器的制作技术来看,主要是用锤击法。从捕获的猎物来看,他们已能用石器捕获到大型而凶猛的野兽,表明已经经过了关于如何制造和使用工具,在围猎时如何协调动作等方面的训练和传授。

2. 火的控制和使用。桐梓岩灰洞发掘的炭屑、烧骨以及水城硝灰洞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灰烬层、烧石、烧骨遗存说明,在数十万年以前,贵州的古代先民已经掌握了取火和熟食的方法,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正是借助了教育活动,取火的方法和用火的经验才得以保存、传播和推广,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生产力而代代相传,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

3. 狩猎和采集食物的技术和经验。原始人群“不耕不稼”,“不织不衣”,过着“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龙之肉”的生活。《尸子》说:“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这个传说,反映了狩猎经济为主的氏族,有丰富狩猎经验的能人,向人们传授积累的狩猎经验。在贵州各地的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骨器和角器都说明了在当时社会,人们以捕捉和采拾动植物为主。因而如何让下一代学会狩猎和采集,如何学会辨识、捕捉和采拾动植物,是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在集体狩猎中,人们还要学会协同动作和遵守纪律。

4. 生活习俗教育。古代先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并随之产生了相应的教育活动。这种教育除结合生产实践“言传

身教”外,更多的是结合习惯与原始民俗活动来施教。在血缘家庭内部,已经产生了长幼之别这种简单的人伦道德教育。在这种名副其实的“生活教育”中,教育的基本方式是言传与身教,言传是说明是非要领以传授经验,身教是做出示范动作,以供模仿,这两者通常是相辅而行。

由于没有文字,原始民族的文化教育主要是以歌舞、雕刻、绘画、刺绣、服饰等形式来表现和传承的,而这些多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相联系。歌舞往往是原始民族表达对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生活憧憬的主要方式,服饰则是他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方式。在这些文化习俗的陶冶中,年轻一代逐渐受到了智育、体育、美育等多方面的教育。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贵州少数民族古朴的歌舞和服饰中探寻到原始形态教育的流风余韵。

借助于贵州民俗学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推测贵州古代先民的教育与我国史前时期的教育具有同样的特点:①教育是公共的、平等的和社会性的活动。②为了生存和生活,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接受教育,教育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事情。③教育与生产生活融为一体。生产生活就是教育,长辈就是教师。④教育的手段是口耳相授和实际模仿,当时还没有比言传身教更有效的教育手段。古代先民为了求得生存,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播撒教育的种子,不断地发展和超越自身。而这种教育一经产生,即为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成为人们获取生存条件的重要手段之一。

史前时期的贵州先民究竟如何从事教育活动,我们无从查考。上述仅仅是根据贵州考古研究资料以及文化人类学和生物学的现有研究成果作一粗略的描述和推测。就人类社会发展史而言,工具和武器的制造、语言的发明、人工取火,远远发生在人类对教育的理性认识和文字记录之前,就较晚出现的水利、耕作、纺织而言,也是如此,而要达到这些成就所代表的文化水平,需要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教育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

但是,对人类早期教育所产生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分。

二、夏商周时期的贵州教育

夏商周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教育出现了较大进步。史称夏代已开始建立学校教育制度,《礼记·学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王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设庠序学校以教之,庠序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宋朱熹注《孟子》,也认为校为乡学。从夏代的经济、文化水平及历史记载等因素考虑,夏代已有学校当可成立,不过这还有待于地下出土文物的证实。商代的学校除了有甲骨文和文献记载外,且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可证。《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证明商代已有文字记载的典籍。文字是教育的工具,典籍则是教育的重要材料。

西周时期,我国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学校教育制度。这时的统治者已经把教育看成是规范人们行为、行使统治权利的有力武器。认为“君子如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①西周教育的历史特征是“学在官府”,官师不分,政教一体。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王城和诸侯都城,分别叫辟雍和泮宫。乡学按照当时行政区划乡、州、党、闾设立,有校、序、庠、塾等几种。乡学中的俊彦可升入国学,国学的优秀则服务于朝廷。教育对象都是贵族子弟,一般平民子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②一般说,在每一乡

^① 《礼记·学记》,《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关于西周“乡”及其以下的行政建制及相应的学校名称,有关古籍及古今学者的解释各不相同。